

研究论文  
Articles

# 略论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的 成立与发展

A Brief Account of the Fou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何启才  
(HO Kee Chye)

## 摘要

1950 年代, 马来亚共产党 (马共) 逐渐往北撤离以化解英国殖民地政府军的军事打压。1955 年, 马共和以东姑阿都拉曼为代表的“华玲会谈”失败以后, 马共便选择在马泰边区建立根据地, 不可避免导致民运及群众逐渐疏离马共。1960 年以后, 马来西亚国内的局势骤变, 加上当局的强力打压, 留守国内的民运分子和边区的马共失去了联系。为了继续反殖斗争, 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 (解阵) 于 1968 年 11 月 25 日成立并成功和马共取得联系, 成为了马共的地下组织。解阵的出现, 适时提供了马共最基本的补给。马共在 1960 年代以后的武装斗争得以延续至 1989 年, 解阵可说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这一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深究。

**关键词:** 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统一战线、地下组织

###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CPM) gradually withdrew to the north in the 1950's as a strategy to overcome the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of Malaya suppression. In 1955, after the "Baling Talks" held between the CPM and the Malayan Government headed by Tunku Abdul Rahman failed, the CPM opted for building bases in the Thai-Malaysian border, thus such a move would cut off its contact with the Ming Yun and the masses. After 1960,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Malaysia changed dramatically. This change coupled with the relentless suppress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underground organisations lost contact with the CPM. To carry on their anti-colonialism struggl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MNLF) on 25 November 1968 and its successful link up with the CPM as the CPM underground organisation had timely provided the CPM the basic and significant supply line, the strength of CPM expanded rapidly, although after 1960 the CPM had reestablished its contact with some people in Malaysia. Consequently, the armed struggle of CPM since 1960's could sustain up to 1989.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MNLF contributed and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and tremendous role. It is the point which is worth the researchers carrying out further study.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United Front, underground organisations

## 一、前言

自从紧急法令于1948年6月颁布以后，马来亚英殖民地政府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围剿马共，并陆续打压其他正在兴起的各民族左翼激进组织。其实，早在1948年以前，英殖民地政府就开始采取行动打压这些激进组织。1946年从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独立出来的“青年觉醒团”（Angkatan Pemuda Insaf），因其激进色彩及获得广泛支持，导致它在1947年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除了马共被查禁外，其他陆续被查封的组织还包括了马来国民党、妇女觉醒团（AWAS）、马来亚农民阵线（BATAS）、国民党和各类职工会等。这一系列的逮捕和查封行动，间接地导致了马来西亚左翼运动逐渐走向式微。

对于英殖民政府的查封行动，马共其实早在1948年3月的会议时，就对当前的局势做了评估和准备。根据陈平的回忆，该会议最后一致通过将升级使用暴力和准备武装斗争的决策。只是，当时陈平等人预测英殖民

政府最快也要等到9月才会采取行动，因此他们认为马共还有时间讨论游击战争的筹备工作。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英殖民地政府采取行动的时间比他们认为的还要更早（Chin Peng 2004: 204-208；陈剑 2006b: 121-149）。在英军的大力围剿之下，马共被迫往北撤离，北上至霹雳、彭亨、吉打和吉兰丹。在紧急状态初期，马共除了依靠抗日时期秘密埋藏的武器和动员秘密部队外，其北上的行动过程更多的是有赖于长期深耕的民间地下组织。

马共成立以来，它在各个时期都组织（有些则是自发成立）有各式各样、涵盖面广的地下组织。例如在战前时期（1930-1941）就有：马来亚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各民族各业总工会、马来亚学生联合会、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等；在抗日时期（1941-1945）有：马来亚抗日同盟、港门干事会、垦荒队，以及军事组织如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抗日后备队、锄奸队等；到了抗英民族解放战争以及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8-1989）则有：共青团、马来亚抗英同盟、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学联、马来亚爱国阵线、马来亚新民主主义青年同盟等，以及军事组织如：马来亚人民解放军（21世纪出版社编辑部 2011：iii-iv）。

在英军的围剿下，马共逐渐往北部撤离。马共于1953初开始部署在边区建立根据地，并于1960年终于完成所有部队的转移。1955年，马共和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马来亚官方代表进行的“华玲会谈”失败后，马共对在马泰边区建立根据地的意愿更显得迫切。虽然在边区建立根据地会使国内民运及群众逐渐疏离马共，但在当时的局势下边区显然是个较好的选择。另一方面，紧急状态时期的各种政策和条件，限制了留守国内的马共地下组织的活动。加上1960年代马来亚的局势风云骤变，信手拈来就有：1960年紧急状态结束、1963年马来亚和沙巴、砂拉越合并成为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1963-1966年马印军事对抗等事件。于是，和马共部队联系似乎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事。为了继续革命斗争，一批有志之士于1968年11月25日成立了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解阵），并成功和马共取得联系，成为了马共的地下组织。

## 二、解放阵线成立始末

马共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统一战线（United Front）的策略十分看重。马共印行的《马来亚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材料》中，就提到了马共各个时期如何展开群众运动和发展革命力量的策略。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提出的一种战略，即通过与其他组织合作或联盟对抗彼此的共同敌人或彼此协议要达致的目标，同时也不放弃彼此之间的分歧。马共在统一战线的运用上，主要注重在两种层面，即：合法/公开、非合法/秘密的群众团体。下文是学习材料关于战前马共的统战策略（21世纪出版社编辑部 2010：103）：

……必须准确地处理秘密和公开、非法和合法的关系，以党和党领导的半合法和非法的革命群众组织为主，同时建立或参加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以便既能够加强地下核心力量，又能够团结广大群众。在日常工作中，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群众斗争中，要根据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觉悟程度，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力求每一次斗争都能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

（摘自：〈我们党在战前地下斗争时期的斗争〉）

马共的统一战线策略虽然在各个不同时期有所变动，但战略的中心并无改变，这使马共后来在组织群众的工作上占了极大的人和，也是马共获得支持的主要来源。而在马共的统一战线领导下的地下组织，尤其是在战后成立且非常活跃、群众动员比较广泛的地下组织，计有马来亚抗英同盟、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解盟）和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解阵）等。抗英同盟和解盟的主要据点是在新加坡。解盟则是在1949年2月1日马共宣布成立“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时成立的（原不二夫 2001：29）。解盟本为马共当年的地下外围组织之一，1955年后沉寂下来。解盟于1965年重新启动后，先后在北京和印尼耶加达设立代表团办事处。其时正处于马来西亚和印尼苏卡诺政府的“对抗”（konfrantasi）期间。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政变后，解盟在印度尼西亚的驻印尼代表团办事处被怀疑和印尼共产

党有关系而于同年 11 月被印尼军队搜查，并逮捕了团长易卜拉欣 (Ibrahim Mohamed)、副团长余柱业等人 (陈剑 2006a: 201-203、293)，导致解盟的耶加达代表处宣告瓦解。此外，解盟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据点也在有关当局的打压下被迫瓦解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1971: 62) 虽然解盟在中国还有驻北京代表团，但它基本上对马来西亚的地下活动无法再起着重大的作用。继解盟式微以后，另一个具有广大群众基础和动员力量的地下组织——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开始冒起，填补了马共和解盟留下的革命空白。马共中委阿成 (单汝洪) 的回忆录中，也肯定了马共的革命事业是依靠地下组织如共青团、解盟或解阵去组织国内的群众支持的 (阿成 2007: 205)。

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 (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MNLF) 是由一批抗英反殖，不满种族政治的群众自发性于 1968 年 11 月 25 日成立，成立地点是在马六甲的爱极乐 (Air Keroh)。这类自发性成立的地下组织，除了解阵以外，还有基地建立在北马的“爱国主义阵线”、以雪兰莪州为主要活动基地的“马来亚独立同盟”、在南马活动的“马来亚新民主主义青年同盟”等组织 (陈剑 2002)。其中，要数解阵的发展最为迅速。解阵主要的发起人为蔡健福、蔡忠龙<sup>1</sup> 等七人。根据蔡忠龙的说法，解阵成立之初约有 200 名成员，主要来自霹雳、彭亨和雪兰莪 (《联合早报》1983b: 3)。有说解阵的成员大部分来自退出劳工党和人民党的前党员 (育之 1983: 8)。据说解阵成立之前，马来亚也存在过另外一个“解阵”，这个解阵被称为“老组织”或“老解阵”，以区别后来成立的“解阵”。据说，“老解阵”是由一名从新加坡逃离到霹雳州，姓张的马共成员发起成立。后来“老解阵”的活动不知何故停顿了下来 (受访者 B, 2011 年 10 月 19 日)。无论如何，相信该“老解阵”和后来成立的“解阵”应该没有多大关系。

在成员方面，据说解阵全盛时期拥有约 1,600 名成员。解阵成员多来自于人民党和劳工党的基层干部和党员，或是一些较具政治觉醒的左翼积极分子。即使马共自 1950 年代北撤后，曾经一度 and 马来西亚国内的地下组织失去联系，但个别的地下组织仍有一定的能力去影响许多受华文教育

的人民党和劳工党党员（朱齐英 2003：40）。1966 年，由人民党和劳工党于 1959 年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解散后，劳工党更是舍弃议会斗争的策略而转为群众斗争。对此，联盟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查封劳工党的许多支部，并对其党员进行大逮捕行动。尤其是 1969 年“5·13 事件”后的逮捕行动，最终导致了劳工党全面瘫痪（朱齐英 2003：46）。因此，在有关当局的高压行动下，人、劳两党的党员为躲避逮捕或是延续他们的斗争而加入马共或是马共的地下组织，并不足为奇。

无论如何，解阵成立以后，主要的任务是要和马共部队恢复联系。解阵通过一些曾经和地下组织或部队有过来往的人士，经过不断地查访以后，最终才和马共取得联系。解阵是在 1969 年底和马共南下的武装工作队之一的“第 12 支突击队”（简称“12 突”）在霹雳州有了接触（方山 2005b：24）。张佐的回忆录里则提到“第八突击队”（8 突）于 1969 年底和霹雳州的解阵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之后就有一批解阵干部和地下人员从“8 突”上队，参加了武装斗争（张佐 2005：401）。而蔡忠龙提供的资料则显示，解阵是在 1970 年 10 月才加入马共，并于 1971 年 8 月正式成为马共的地下组织（《联合早报》1983b：3）。由于负责替解阵和马共接线的联系人已于 2009 年辞世，后人恐难知悉并还原解阵和马共这段颇费周章的接线过程了。无论如何，若将前述的几条资料串起，相信其过程是解阵经过多番的查访后，终于在 1969 年底和马共突击队取得联系后被呈报，最后被马共北马局接纳成为马共的地下组织。因此，解阵在 1970 年 10 月正式成为了马共统战的一分子。

解阵被接纳成为马共的一员后，其斗争方向很大程度和马共发表《新方针》后的斗争方向吻合，也是马共向南挺进计划中必须建立的战线。马共在 1961 年 9 月第十一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后，重新确立了“将武装斗争进行到底”的路线，发布了“积极坚持、逐步发展”的《新方针》。《新方针》政策的主要内容计有（方山 2005a：118-119）：

1. 将“偃旗息鼓、埋头苦干”改为“重整旗鼓、放手大干”；
2. 停止“退伍政策”，积极吸收党军新成员；
3. 由不搞群众组织改为大搞群众组织；

4. 采取积极防御方针；
5. 要有敢于斗争的精神、善于斗争的素养以及掌握严防敌奸破坏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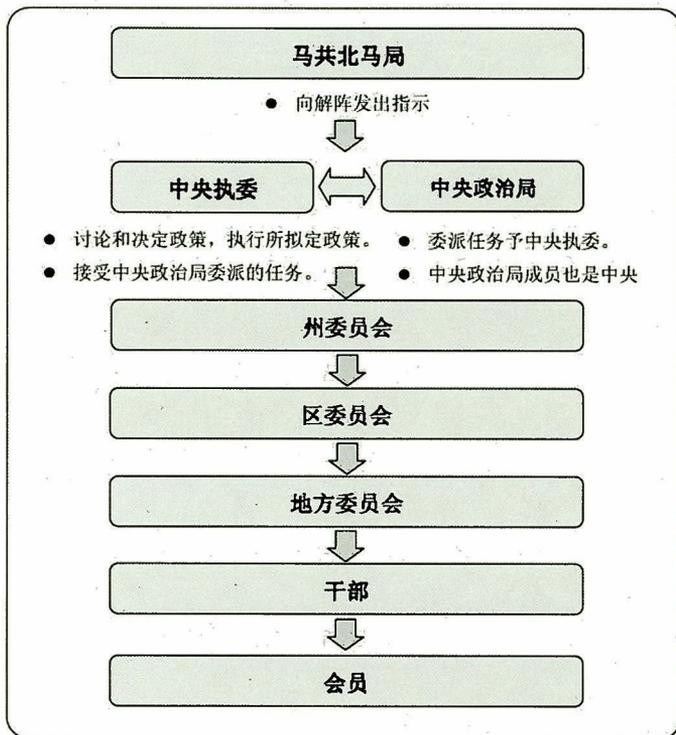
《新方针》的颁布实际上是针对马来亚于1960年7月31日宣布结束实施了12年的“紧急状态”，以及在8月1日通过“内部安全法令”取代“1948年紧急法令”的新局势。同时，《新方针》也纠正了马共1958年以后“精兵简政、偃旗息鼓”，逐步停止武装斗争的消极思想（方山2005a: 76）。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正式成立，马共中央委员会随即于9月20日发表了《关于‘马来西亚’问题的声明》。该声明强调“马来西亚”乃是英国的“新殖民主义”阴谋，矢言将和新加坡、北加里曼丹人民结成反帝战线，以进行长期、艰苦的武装和非武装斗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71: 34-38）。这可说是马共在发表《新方针》后，正式明确化其主要斗争目标——“粉碎新殖民主义”的一份重要声明。到了1968年6月1日，马共再次发表武装斗争的重要声明《高举武装斗争伟大红旗，奋勇前进！》，发出号召准备挥军南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71: 73-78）。从明确化敌人到吹响进军号角，再到挥军南下，马共耗费了近六年时间进行准备。马共的突击队最终于1969年正式向南挺进。因此，解阵成立后的积极查访，最后和马共成功接线可说是“恰逢其时”。

### 三、解放阵线的政治架构及其活动

1983年发生在新加坡“陈书华碑文案”（Tombstone Inscription Case）<sup>2</sup>中，前解阵发起人之一的蔡忠龙以证人身份发言，并透露了解阵的内部情形。按其所言，解阵的组织大致如下：

图一：解阵的组织架构及其职务说明



资料来源：整理自《联合早报》(1983b: 3); *The Straits Times* (1983b: 14)

若对上述组织架构的理解正确，解阵可说是一个由上而下的组织。解阵成为马共的政治力量后，接受了来自马共北马局的指示进行活动。北马局的活动地点主要在马泰边区、吉打和吉兰丹。解阵中央政治局负责分析解阵各委员提呈的报告书，然后发出工作指示或委派任务予中央执委。这些报告书的内容通常是有关设立食品提供站、武装训练、地理环境等。解阵中央执委负责传达指示予解阵成员。1971年，解阵中央政治局就设立在霹雳州的丹那依淡附近，主要负责民运工作。当时马共的第五突击队（5突）也驻扎在丹那依淡森林地区，和解阵紧密配合，互相开展群众工作。

1978年11月20日，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简称“解阵”）庆祝成立十周年的前几天，发表了一篇题为《坚决贯彻党的地下工作方针——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纪念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纪念声

明》。该声明除了表达了解阵对马共的领导和其政策的坚决拥护外，也总结了解阵成立以来的十年间，曾经扮演的角色和取得的成就。根据该声明内容，可以得知解阵的主要的工作大致为以下几个方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n.a.: 139-144）：

- (1) 出版宣扬革命的册子教育解阵成员，如出版《东方红》、《燎原》等；
- (2) 推动群众支持革命，如升挂红旗、散发传单、鼓励群众收听“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
- (3) 开展群众工作，积极参与并支持群众的反剥削反压迫反歧视斗争；
- (4) 配合马共的人民解放军消灭敌人。

据前解阵成员透露，他们加入解阵以后，其上线要求他们履行任务大致上如上述所说的，即尽可能地发展人员、有能力就捐钱、派发传单、收听“革命之声”电台等等（受访者 E，2011 年 5 月 2 日）。此外，据另一名前解阵成员的回忆，他们还会提供情报、日常用品、武器等给予马共。他当时加入解阵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制作武器配备，如手榴弹外壳等。武器配备制好以后，会有交通员向他取货（受访者 D，2011 年 4 月 29 日）。除了上述的工作，马共突击队也会安排训练班予解阵干部，以便招收和训练新兵。因此，当马共突击队在 1970 年南下后，许多解阵的干部都加入了突击队。解阵最早于 1970 年 11 月开始就选派其成员加入马共突击队，首批加入的解阵成员是从 8 突上队。大部分上队的解阵干部，还是会继续负责解阵的地下工作。此外，如果有解阵成员身份被曝露而无法公开活动，解阵组织就会想办法将他转入地下，最后被安排进入某个“点”（即秘密活动的地点）学习，最后被安排到马共的部队。

在活动方面，解阵成员在 1970 年代的武装斗争方式曾引起许多议论，除了参与马共突击队的游击战外，解阵也在城市地区进行了武装袭击的行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媒体将解阵的行动形容为恐怖活动。表一为《联合早报》对解阵在 1974-1978 年期间，在马来西亚涉及的活动及其后果的统计（《联合早报》1983a: 9）：

表一：解阵在马来西亚的活动情况

年份	活动及后果
1974年6月25日	16名解阵成员在隆被捕，并卤获枪械及现款。
1974年8月	在马六甲起获军火并逮捕2名解阵成员。
1975年5月18日	两名西马政治部探员在隆被解阵成员杀害。
1975年5月18日	隆国家纪念碑遭炸弹破坏。
1975年12月	隆解阵地下室被发现。
1976年5月10日	森美兰日叻务县新邦葫芦镇警局，遭共党分子抛掷手榴弹。
1976年8月24-25日	4名共党地下分子被击毙，其怡保匿藏处起获枪械军火。
1977年3月24日	新山两名警方人员被解阵分子枪杀。
1977年6月15日	前解阵成员透露了一个设在森林的枪械制造中心。
1977年7月3日	3名解阵分子被击毙并起获枪械和军火。
1977年7月	由马共州委黄天德领导的解阵在隆负责制造军械的单位被粉碎（新加坡的单位也在1977年7月瓦解）。
1978年2月	56名解阵成员在马六甲被逮捕，大量枪械及军火被破获。
1978年5月23日	在瓜拉庇朥起获解阵一个供逃亡地下分子使用的粮食储藏库。

在新加坡方面，最早撰文深入解剖“解阵”面貌和内幕文章的，是出自于一位笔名“育之”的新加坡作者。在他的文章《马共地下组织解阵——一个恐怖的代号》中，他将1970年4月23日发生的“樟宜爆炸案”视为解阵在新加坡展开恐怖活动的第一项罪行。当时，有两名英国籍小孩发现樟宜监狱外的空地附近有一面红旗，其中一个便将之拉起引发了爆炸，其中一个在送院后第二天不治身亡。警方过后在出事地点找到一些解阵的文件。前马来西亚政治部副主任 Alloysius Chin 提到，“爆炸装置”（explosive booby-traps）是马共的地下组织在革命运动中第一次使用的激进手段，导致许多警员因试图移除这些爆炸装置而遭遇伤亡。他认为，该次

的革命运动是受到马共于 1969 年 8 月指令的启发而进行的 (Alloysius Chin 1994: 158)。Alloysius Chin 所谓的 1969 年 8 月指令, 应是指马共向南挺进的军事行动。解阵后来有对于 1970 年的活动做出声明, 指解阵此举意在庆祝马共成立 40 周年, 同时宣传革命思想和推翻英美的帝国主义, 并给予他们的敌人在政治上沉重的打击。

育之在其文中也提到解阵渗透了新加坡的军警部队, 曾经计划暗杀内安部官员和高级警官。马共自 1969 年以来, 在新加坡进行了 22 宗火车事件和 11 宗爆炸事件, 其中多数是由解阵所为。另外, 解阵也在新加坡成立了“快速部队”的武装单位, 计划进行暗杀行动。除了上述恐怖活动外, 新加坡解阵在 70 年代进行的其他活动, 如张挂旗帜和宣传布条、分派宣传地下刊物、小册子、利用马共秘密电台之类等等, 大约发生了 264 宗 (育之 1983: 8)。

育之所述及解阵在新加坡的“恐怖活动”, 其实是一项涵盖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全国性活动。这项活动是于 1970 年 4 月 22 日开始展开, 解阵将之称为“四月宣传运动”。有关“四月宣传运动”的记载刊登在解阵于 1972 年 4 月 20 日发表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 (社阵) 机关报《阵线报》里的〈庆祝马来亚共产党成立四十二周年〉声明中:

……一九七零年, 为了庆祝马来亚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 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开展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四月宣传运动”。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二日晚上八点到十一点, 同志们在全国八个州的许多地方一致行动, 升起了五百面红旗。其中雪兰莪州一百多面, 霹靂州九十多面, 散发了几万份告同胞书。同时, 还安装地雷, 张贴标语, 悬挂大字横幅。第二天, 地雷到处开花, 炸死炸伤伪军警, 特务走狗十多人。这个宣传运动, 影响很大, 在政治上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阵线报》1972: 4)

解阵的这份声明, 阐述了解阵的斗争方式和目标。文中提及了解阵的成立是为了加强统一战线, 积极发展武装斗争, 以推翻英美帝国主义 (《阵线

报》1972: 4、9)。因此,育之所说的“恐怖活动”,对于解阵来说,则是“以革命的暴力反击反革命的暴力”的斗争方式。

解阵于1970年加入马共成为其政治力量的时期,正值马共突击队重新深入马来西亚恢复武装斗争的时候。因此,解阵从1970年以后陆续发起许多活动如悬挂红旗、分派传单,甚至是置放炸弹的行为等,其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当时意识形态显著对立的年代,双方坚定地拥护彼此的信仰,继而执行彼此认为的正义行为等等,只能看作是战场上的生死之战。马共和解阵在武装斗争中杀害了敌人的军警并误杀群众,和政府军警在反共斗争中杀害共产党分子和误杀平民,这两种暴力的行为对于双方来说其实是等同的。回顾历史,峇冬加里(Batang Kali)大屠杀<sup>3</sup>、武吉加逢(Bukit Kepong)事件<sup>4</sup>、5·13族群冲突等事件,不也是如此?而最终掌握历史话语权的,始终落在取得胜利的一方。

#### 四、结语

作为一个积极的地下组织,解阵理应是非常严密和谨慎的组织,以防机密被泄露或被渗透。据一名前解阵成员分析,解阵本应是单线(秘密式)招收成员,可是后期就出现了一些混乱,如在同一范围不广的地方(尤其是大学)发展了许多条线,有些线甚至有重叠的现象,因此变得很容易暴露身份。

此外,也不排除这种不严谨的方式容易被政治部渗透,政治部有一种“拉出来,打进去”的做法,即捉了解阵成员后使他背叛解阵,然后再放回解阵活动。如此一来,解阵就容易变质(受访者E,2011年5月2日)。因此仅在新加坡,从1971年至1981年间被逮捕的解阵成员就有约340名。而截至1981年就有超过700名马共地下成员在新加坡被逮捕(*The Straits Times* 2008: 34)。由此可见,有关当局的严密监控,加上解阵组织上的疏漏等因素,或是导致解阵在1980年以后逐渐走向瓦解的致命伤。

诚如前述,解阵的出现恰逢马共向南挺进的时期。加上解阵的活跃发展,成员众多,活动覆盖面广泛,因此解阵加入马共后适时地给予了马共

恢复武装斗争的各方面的需要。因此，若要分析马共自 1948 年至 1989 年，这段长时间的斗争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解阵以及其他地下组织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略的。由于至今尚未有任何有关解阵方面的系统性研究，本文也仅能利用有限的材料，如新闻报道、相关回忆录、与部分当事者访谈等方式，粗略地完成本文。虽然如此，在马共研究或本土左翼运动研究日渐受到重视的今日，其地下组织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和研究马共不同的是，通过研究地下组织，更能提供我们关于普罗大众是如何看待革命运动、如何追求他们的社会理想和国家建设，并通过他们的视角去理解马来西亚一路走来的社会矛盾。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期待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相关研究成果出现，建构出一个全面且勇于向历史负责的马来西亚历史。

## 注释

- 1 新加坡《联合早报》将“蔡忠龙”（Chai Choong Loong）译作“蔡春良”。蔡忠龙绰号“独眼龙”，本为解阵中央执委，也是解阵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之一。1974 年 1 月加入马共，同年 6 月被捕。1975 年中转为担任新加坡内部安全局（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 ISD）研究人员。
- 2 “碑文案”是指已故新加坡解阵区委陈书华的哥哥陈书文，因在其弟墓碑刻上褒扬弟弟一生“英雄烈士”行为的墓志铭，被新加坡政府提控他触犯内部安全法令。新加坡法院最后判他罪名成立，坐牢一个月。陈书文后又被告控拥有颠覆文件，并于同年 11 月 23 日开审，经过 5 天审讯，被告罪名成立判监一年（《联合早报》1983c: 1）。陈书华为新加坡人，1976 年因参与解阵而遭到新加坡政府通缉。1979 年在柔佛被马来西亚警方逮捕，并被控非法拥有手枪和 8 枚子弹，触犯了马来西亚的《内安法令》而被判死刑。此后，国际人权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发起一项国际运动，要求马来西亚赦免陈书华和其他在相关法令下被判死刑的马共人员。这项运动以失败告终，陈书华于 1983 年送上绞台，遗体送回新加坡安葬在蔡厝港华人坟场（详见 21 世纪出版社编辑部 2009: 81-104; *The Straits Times* 1983b: 1）。
- 3 峇东加里大屠杀发生在 1948 年 12 月初。当时马来亚正值紧急状态初期，英国殖民地政府正紧密进行围剿马共的战争。在剿共的一场行动中，有 25 名居住在雪兰莪州峇冬加里一处胶园的华人胶工被怀疑是共产分子而遭屠杀，只有其中一人侥幸生还。目前，死者家属和社团成立工委向英国政府讨回公道。关于此事件的研究报告，可参阅 Ian Ward & Norma 2009。

- 4 1950年2月23日，柔佛州武吉加逢发生了共产党游击队袭击当地警察局事件。当时的警员和村民与共产党作战，导致双方共约60人丧生。此事后来被拍成电影《Bukit Kepong》，马来西亚官方将它作为爱国教育片，于每年在8月欢庆独立日时播放。片中描述了华人共产党残暴攻击并杀害马来警察和村民，以及马来警察如何取得最后胜利。这部片子具有浓厚玩弄马来人和华人民族情绪的意味，因此当回教党副主席末·沙布（Mat Sabu）于2011年8月揭露实际率领攻击武吉加逢警局的人是马来独立斗士末·英德拉（Mat Indera）后，引起巫统保守派，甚至资深学术人员的群起反击，有者言论更是荒唐无理。此论争的延烧，也促使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辈开始反思国家独立的历史。

## 参考资料

### 中文部分：

- 阿成 2007。《我肩负的使命——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 陈剑 2002。《浅谈意识形态与劳工党的斗争》，2011年10月15日读取，  
<http://www.xiao-en.org/cultural/academic.asp?cat=63&loc=zh-cn&id=1096>
- \_\_\_\_ 2006a。《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雪兰莪：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 \_\_\_\_ 2006b。《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吉隆坡：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 21世纪出版社编辑部 2009。《内安法下的忠魂——蔡忠瑛、陈书华、曾福华等烈士》。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 \_\_\_\_ 2010。《马共文集第一辑：战前地下斗争时期（一）——建党初期阶段》。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 \_\_\_\_ 2011。《马共文集第三辑：抗日战争时期（一）——党军文件集》。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 方山 2005a。《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一集：根据地重整旗鼓——新时期·新方针》。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 \_\_\_\_ 2005b。《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万水千山密林情——南下·北上·肃反·分裂·土地·民族》。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 联合早报 1983a。〈解阵在马来亚的活动及下场〉，《联合早报》，11月20日。
- \_\_\_\_ 1983b。〈武装训练·设食物站·熟悉地形 马共卫星组织解阵活动揭秘〉，《联合早报》，11月24日。
- \_\_\_\_ 1983c。〈碑文内容具颠覆性·陈书文被判监一年·以两万元签保等候上诉〉，《联合早报》，11月30日。
- 育之 1983。〈马共地下组织解阵——一个恐怖的代号〉，《联合早报》，11月20日。

原不二夫, 刘晓民译 2001。〈马来亚共产党与中国〉, 《南洋资料译丛》, 第 4 期 (总 144 期)。

张佐 2005。《我的半世纪: 张佐回忆录》。吉隆坡: 张元出版。

阵线报 1972。〈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发表声明·庆祝马来亚共产党成立四十二周年〉, 《阵线报》(新加坡), 6月4日, 版 4, 9。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1971。《马来亚共产党文件选编: 1960年-1970年4月30日》。北京: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_\_\_\_ n.a。《马来亚共产党文件选编: 1975年5月-1981年6月》。北京: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朱齐英 2003。〈劳工党的民族、民主斗争〉, 载潘永强、魏月萍主编, 《民间评论 (2): 华人政治思潮》。吉隆坡: 大将出版社。

### 英文部分:

CHIN, Aloysius 1994.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the inside story*. Kuala Lumpur: Vinpress.

CHIN, Peng 2003. *My Side of History*.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WARD, Ian & MIRAFLOR Norma. O. 2009. *Slaughter and Deception at Batang Kali*.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The Straits Times* 1983a, 31 May. Tombstone inscription case: man is charged.

\_\_\_\_ 1983b, 24 November. Phrases show intention to overthrow govts.

\_\_\_\_ 2008, 16 April. Battling communist militants in the '70s.

### 采访资料:

受访者 B。2011年10月19日。吉隆坡。

受访者 D。2011年4月29日。吉隆坡。

受访者 E。2011年5月2日。吉隆坡。